

任继愈的老学观和道教观研究

柴文华, 李迪

(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哲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摘要] 任继愈对老学和道教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对老学的源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老子尊道、贵无、尚柔、治国等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既肯定了其无为而治的当代价值,也指出了其提倡愚民、反对社会进步的消极性。任继愈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系统地阐述了道教的发展轨迹。任继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主张对老子思想和道教文化进行历史和辩证的分析,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

[关键词] 任继愈;老子;道教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4)02-0012-05

任继愈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他多年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主编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等影响广泛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任继愈对老学和道教有专门的研究,著有《老子新译》、《老子绎读》、《道藏提要》、《中国道教史》等,对老学的源流及贡献、道教的发展史等做了深入的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的老学和道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

任继愈对老子之学的源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发。

1. 老子其人

对于老子的生卒年代,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任继愈认为,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时间上略早于孔子。任继愈指出,推断思想家的年代,主要应该依据可靠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单从思想内容推算,可能会出现不同结果。郭店竹简的出土,为确认老子的时代提供了重要证据。

2. 老学之源

任继愈指出,老学发轫于荆楚,但老子不是乡曲之士,他曾到过北方,当过守藏史,熟悉历史文献,接触过社会现实。根据老子的生活经历,任继

愈将老子思想的来源概括为以下三个:

第一,老学继承荆楚文化的特点,贵淳朴自然,反雕琢文饰。任继愈指出,老子思想来源于荆楚文化,集中表现为对“水”的歌颂。荆楚水乡,水是万物生存和人类生活的依托,老子对水性有着深刻的体悟和高度的赞美,如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老子》三十四章)老子把水比做道,又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七十八章)

第二,老子博学多闻,善于吸取古代文化遗产,总结前人经验。任继愈指出,《老子》书中常借用植物生长的例子,说明贵柔的道理。植物幼苗柔弱而有生命力,植物长大后,则枯槁而接近死亡。此外,《老子》书中还经常从前人经验和古文献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如:“古之善为士者(马王堆本作“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老子》十五章)“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老子》五十章)

[收稿日期] 2013-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哲学史学史”(09BZX032);黑龙江省2013年“六个一批”人才项目。

[作者简介] 柴文华(1956-),男,安徽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和伦理文化。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老子》五十七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六十五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老子》六十九章）《老子》书中的“建言有之”、“盖闻”、“圣人云”、“古者善为道者”，表明这些说法都有来历。

第三，老子亲眼看到春秋时期社会的混乱，旧秩序的崩溃，仁义口号的虚伪性。任继愈认为，老子为亲眼看到当时从周王朝到地方诸侯的混乱无序而失望，他激烈地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弊端，如：“夫佳兵者，不详之器。”（《老子》三十一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民之饥，以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七十五章）“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孝。”（《老子》十九章）老子深刻看到在仁、义、礼等口号下产生的种种弊端，于是放弃仕途而走向隐逸。

3. 老子的主要思想

任继愈着重从遵道、贵无、尚柔等方面阐释了《老子》的思想内容。

第一，尊道。“天道观”是先秦时期的热门话题，许多哲学家都对“天”和天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任继愈指出，老子是第一个把“道”作为最高范畴进行阐发的人，他天道观的要点是：首先，“天”是没有主观意志的，是自然无为的。其次，“天道”是循环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再次，道是混沌的，是朴素的。另外，道是超形象、超感觉、超名言的；还有，道是一种原始质料，即“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老子》二十五章）任继愈认为，老子的贡献是降低了上帝或神灵的权威，使哲学初步从宗教或神学中分离出来，并把道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标志这人们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

第二，贵无。任继愈指出，人们认识外部世界，总是先从身边的事物开始，由近及远，从而形成了“有”的概念。这个“有”是具体可感的，有形体，有大小，有颜色，有气味，有轻重，有坚柔，等等。任继愈认为，这一阶段的认识还是低层次的、初级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步认识到“有”的对立面“没有”，把“没有”提升为“无”的概念是老子的又一贡献，它也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与此相关，老子认为应该用“无”的原则来处理人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于是提出“无为”的概念。“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用“无”的原则，也可以说是

“道”的原则去“为”。老子的“无”有它的贡献，但强调过头难免走向谬误。老子的贵无思想对黄老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尚柔。任继愈指出，老子认为水最接近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认为水看起来是最柔弱的东西，攻坚克难没有能胜过它的，所以老子主张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看，“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柔弱是道的作用；从人类生活和自然现象来看，“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用于处世之道，老子主张不争强斗胜；用于用兵布阵，老子主张后发制人；用于作战，老子主张以守为攻，以逸待劳；面对强大的敌人，老子主张避实击虚。任继愈认为，老子尚柔的主张是弱势群体的哲学主张，是弱势群体处世、生活及诸多方面的经验总结，是一种柔弱的辩证法。但它影响深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老子以弱胜强的战略指导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治国。在治国方面，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方针政策。任继愈认为，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不扰民，与民休息，减轻人民负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七十五章）老子指出用刑罚治国，不是好办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他理想的社会的人们都能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这显然是一种宁静、自给自足、安适的田园生活，是小农生活的理想画卷。老子认为，仁义不是最高的追求目标，“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才是治国的最好原则，即让百姓自由自在地生活，君主不予以干涉。

4. 价值与局限

任继愈指出，我们今天既要肯定老子思想的积极影响和现代价值，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辩证分析，批判继承。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举足轻重。农民稳定社会就稳定，农民不稳定社会就会混乱。直至今日，虽然我们已经走进工业化时代，但依然需要重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就会受阻。老子一派是

以广大小自耕农为其社会基础的,他们反对过多干扰农民的生活,主张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这种理念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另外,老子自然无为、柔弱谦下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也有参考价值孩子。

任继愈指出,老子反对欺诈、虚伪,倡导纯真、朴素,这些思想在他无为政治理论中讲得比较充分,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光辉。但这一观点讲过了头,就会走向谬误。为了保持纯朴,而反对知识;为了反对欺诈,而提倡愚民。反对欺诈是好的,但提倡无知、表彰愚昧是错的。社会的进步在于脱愚,开发人的智力。智力低下、文化落后的民族将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老子看到“大智若愚”不是真愚昧,“大巧若拙”不是真的笨拙。老子的倡导淳朴、轻视文化的思想,两千多年来深入人心,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起作用,以致影响国家的文化政策。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把农村看成净化灵魂的圣土,把城市看做孽生罪恶的渊藪。全世界科技突飞猛进,我们却反对读书,阻碍了系带话的步伐,拉大了与科技先进国家的距离。

二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继愈对道教的发展历程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

1. 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初步发展阶段,从民间宗教逐步发展为官方宗教。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标志着秦汉时期中国国家大一统局面的结束,此后,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约四百年之久的分裂,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全国。在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儒家学说虽然曾是国家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但它在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地位已相对削弱,道教与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奠定了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

任继愈指出,道教在东汉后期开始迅速在民间兴起,出现了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民间道教团体,由于早期道教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所以魏晋时期的民间道教遭到统治集团的禁止,于是出现了比较符合统治集团口味的神仙道教。两晋之际的著名道教学者葛洪,便是这一派突出的代表。他的《抱朴子·内篇》第一次对长生说和神仙说做了系统的逻辑论证,从理论上阐述了神仙必有的道理。为了转变和实现道教的社会作用,葛洪宣传求仙以积善为本的观点,试图把道教修炼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

合起来,使道教成为具有多方面适应性的宗教,推进了道教从原始民间宗教向官方宗教的演变。葛洪去世后,以丹阳士族杨羲、许谧等人制作《上清经》为标志,从东晋十六国后期至南北朝时代,中国南北方都出现了由门阀士族道教徒发起的道教改革活动,道教的发展进入新的高潮。以重视经典科教与神仙养生之术为主要宗旨的道教新派别孳乳繁衍,成为道教发展的主流。而民间道教经门阀士族改造后,终于消融在南北朝新道教中,南北朝以后形成的茅山派、楼观派等成为隋唐时期道教的正宗。

2. 隋唐道教

任继愈认为,隋唐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道教的繁荣时期之一。隋皇朝建国之初,隋文帝利用道教编造“受命之符”,为他篡夺北周政权制造舆论,故隋文帝对道教加以扶植和崇奉,使道教有所发展。在唐朝,道教处于儒释两教之上,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老子被尊为唐宗室的“圣祖”,先后被册封为“玄元皇帝”和“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等。《老子》亦被尊为《道德真经》,成为道教的首经。道家的庄子、列子等均被尊为“真人”,其著作被尊为“真经”。唐玄宗亲自注疏《道德真经》,颁之全国,令士庶家家习读,使《老子》得以广泛的传播。由于唐皇朝的倡导,唐代研究老庄思想的风气很盛,据不完全统计,隋唐时仅道士注疏笺解《老子》即近三十家,其他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理论著作也很多,如通玄的《道体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等等。唐代禅宗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隋唐是对道教理论研究的兴盛时期,它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重玄”哲学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隋唐对道籍的整理和研究亦较重视,专门设立玄都观,研究三教之学,整理道教教义。道教仪法在唐朝经过系统的整理和增删,更加趋于复杂和完备。隋唐道教炼养术有较快的发展,司马承祯的《服气精义论》、《修真精义论》及其他类似著作,对推动炼养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唐末五代,由于社会动乱,很多道教宫观被毁,道士星散,道教衰落。一些儒生和失意的王公官吏为避乱而纷纷隐遁于山林,有些即与道教发生联系或成为道士,他们以避世保命为主,不求闻达于诸侯,修炼亦以内丹为主,促使了内丹术的迅速发展。唐代道教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建筑等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总之,唐代道教是道教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以后道教的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

3. 宋元道教

宋辽金元是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当尖锐的时期,道教进入到一个发展、变革的新阶段。

任继愈指出,北宋以真宗、徽宗为代表的历代帝王对道教较为崇奉。南宋民间的道教活动较为活跃。在北方金国,还兴起了太一教、大道教、全真教等新道教,广泛流传于民间,呈蒸蒸日上之势。元朝对道教各派皆有扶植,一批民族义士和失意知识分子纷纷涌入道教,是道教呈现出繁盛的局面。

宋元时期各派道教教义的共同特点,“是顺应三教思想融合的时代思潮,盛倡三教同源一致,融摄佛、儒二家之学,使这一时期的道教学说带有融合三教的浓厚色彩。”^{[1]561}任继愈认为,三教所共同探讨的心性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道教哲学的中心课题,所谓“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心性被看做三教共同之源。在宋代,道教受禅宗影响最深,金丹派南宗和全真道皆以融合道教内丹与禅宗之禅为其学说的特质,提倡明心见性、性命双修,其心性之说,颇近于禅。至元代,道教哲学则更多地融汇理学。此外,宋元时代的道教教义,还以内丹术的盛行和内丹学的成熟为一大特点,专主内丹修炼的群众性教团全真道、南宗首次创立。全真道、南宗继承发扬钟吕系内丹,向内丹与禅双修的路数发展,形成了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两个不同的在修炼次第上的派别。

《悟真篇》、《翠虚篇》、《金丹大要》、《中和集》等一批内丹学著作相继问世,内丹理论在传统道教内丹术、炼养术和宇宙论的基础上,融摄佛、儒之学及中医、天文学等知识,臻于成熟化。道教内丹哲学对儒学影响甚深,是周敦颐、邵雍哲学思想的一大渊源。这一时期的内丹术还影响于诸家的符箓道法,各符箓道派率皆融合内丹与符箓,倡“内道外法”、“内丹外用”,以内丹修炼为施行符箓咒术之本,强调书符念咒时须正心诚意,以“一点灵光”即先天元神主事。道教符箓道法至此而成熟化、理论化。教义、教制充分成熟化的宋元道教,为明清道教奠定了定制。

4. 明清道教

明清是道教走向衰落的阶段。

任继愈指出,明清两朝统治集团对道教的态度不尽相同。明代诸帝对道教尊崇敬奉,对道教教团管理严格。明太祖一再敕令,清整佛、道二教,他从顺应民俗、宣扬伦常的目的出发,保护道教,命道士编成斋醮仪范,突出宣扬伦常的内容,定为玄门统一模式。明成祖崇奉真武神,利用真武显圣的神话

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成祖以后的明室诸帝,对道教的信奉多局限于低层次,营室斋醮,迷信扶乩降仙、各种方术。满清贵族对道教本无信仰,入关后对已衰落了道教不很重视,利用道士斋醮作法之事,比前代要少得多。

明清两代,道教著作中,三教思想融合的色彩更为浓厚,尤多和会儒学。道教教义、教制总的来说无大的发展,被道士通俗化了的内丹术,超出仅在道教中传播的范围,作为一种炼养术,传向社会,在儒士中影响尤深。一批道教劝善书如《太上老君感应篇》等,经官僚文士的倡导,作为一种宣传伦常的通俗读物广泛流传于民间。扶乩降仙之风,在道士、儒生中十分盛行,一批假扶鸾所造的道书纷纷出世,或阐述金丹,或宣扬三纲五常,皆具有三教融合的色彩。各种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庙,尤城隍庙、真武庙、吕祖庙、关帝庙等,林立於城镇乡村。道教的神仙信仰、金丹修炼说,渗透于这一时代的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各种民间宗教,亦多吸收道教思想。到清朝末年,道教虽然式微,但其作为一种传统宗教信仰,依然对民间产生着重要影响。

5. 近代与当代道教

近代的道教,受到了民主革命潮流的猛烈冲击。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家对儒教、道教的思想曾予以批判。而袁世凯等则继续利用道教。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对旧宗教、偶像崇拜等予以抨击,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知识的宣传,荡涤着宗教迷信观念,在革命队伍和知识界,道教的宗教观念迅速失去了地盘。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决定废止的神祠庙宇中,如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等神庙,皆属道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破除迷信。面临急剧的社会变革,道教界人士为维护本教,成立过一些道教徒的群众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遵循马列主义宗教政策,在宪法中对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予以保护。1957年,全国性的道教徒群众组织“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白云观成立,岳崇岱、陈撄宁递任第一届、第二届会长。“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道教和其他宗教一起受到冲击,“中国道教协会”停止活动,不少宫观和道教文物被破坏。自中共中央拨乱反正以来,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逐步落实,“中国道教协会”于1980年重新开始活动,各地道教宫观逐步恢复,道士们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并努力实现劳动自养。任继愈指出,在现代文明冲击下,道教继续衰落,这是社

会发展所决定的必然趋势,但作为一种历史最长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教义宗旨颇具独特性,可谓集中华民族传统宗教观念大成的中国本位宗教,道教不会于短时期内消亡。

总之,“道教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影响颇大,深深渗于民族文化的诸多方面。道教文化中精华与糟粕混融,不乏值得批判地继承发扬者。近几十年来,道教的炼养术被加以科学的改造,运用于医疗与气功养生,证明有治病健身、延年益寿之效,其影响有日益扩大之势,与印度瑜伽术逐渐脱离宗教而传播的情况相仿佛。道教的宇宙论、本体论及对人体生命的解释,作为一种颇具启发性的古代思想资料,受到中外科学家的注意。道教与佛教等古代东方文明天人合一、追求与大自然和谐的思想,正在引起欧美人士的兴趣。道教文化将来的命运,只会是扬弃,而不会是全盘摒弃。”^[568]

三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即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史。中国哲学史学科经历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大体有“前史阶段”、“创立阶段”、“马克思主义化阶段”、“港台发展阶段”等。从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任继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重要代表,他的老学观和道教观透出这一时代的鲜明特征,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来阐释老学和道教。

任继愈的老学观对老学产生的原因做了深入的分析,抓住了老子思想的要旨,即遵道、贵无、尚柔等,并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如认为老子的哲学使人从宗教、神学中初步摆脱出来;老子发现了“无”的价值,把它提高到应有的地位,但把“无”的作用无限夸大就会走向荒谬;老子的柔弱辩证法在军事上有重要的价值;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柔弱谦下的处事方式,仍值得借鉴;老子反对欺诈是好的,但提倡无知、表彰愚昧是错的,等等。任继愈对道教的整个发展历程做出了宏观的勾勒,对每一个阶段的特点也做出了细密的分析,并主张对道教文化批判地继承,科学改造道教的炼养术,注意吸收道教的本

体论、宇宙论、生命论中的合理因素,发扬道教中天人合一、追求与大自然和谐的精神,同时剔除其迷信性的糟粕等。任继愈在对老学和道教的阐释过程中坚持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揭示了老学和道教产生、发展、兴盛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等,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老学和道教的认识。

任继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诚如他自己所言:“全国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初步学到了这个方法,使我十分振奋。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个选集的文章都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中国文化、说明中国哲学发展的习作。”^[2](《自传》P2-3)但任继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形式化、教条化。他指出,不能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公式化,给哲学家贴标签不能如实地反映哲学家本来面目。他指出,1957年以后有些讨论是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讨论,以讨论开始,以批判告终。这种风气造成了学术界的不安定、不团结。学术界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有一派人“一贯正确”,是专门批判别人;另一派人则是只能受批判,无权答辩,成了学术上被专政的对象。^{[2]48}有些人在研究中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相当严重,他们往往不自觉地用对待封建帝王那样的态度来对待马、恩、列、斯,“写在本本上的绝不敢有疑问,本本上没有写的更不敢多想。思想停止活动,就是僵化的开始。”^{[2]15}所以,“如果脱离了具体分析,不顾时间、地点、条件,把几条原则或个别词句生搬硬套,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成包医百病的灵丹,或当作驱疫防邪的符咒,那不是尊重马克思主义,而是糟蹋了马克思主义。”^{[2]51}可以说,如同他对老学和道教坚持辩证分析一样,任继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辩证的。

[参 考 文 献]

- [1] 任继愈.任继愈宗教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2] 任继愈.任继愈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谢光前)

